

墨家的道德乌托邦思想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沈慧芳

(武夷学院 政教部,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墨家的道德乌托邦思想包括“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道德理想、“尚贤”与“尚同”的政治道德理想和“非攻”的天下和平理想。这种基于“兼爱”理论而构建起来的道德理想,在封建等级社会和专制体制下,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在战国时期动荡无序的社会里,广大人民向往平等、民主与和平的美好愿望,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道德乌托邦;兼爱;尚同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6-0016-03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动荡、无序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动荡、无序乃至无道的社会里,刚刚觉醒的士人群体从各自不同的理想和愿望出发,自觉担当起“救世”的重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兴邦治国、救世济民为己任,构建了一个以“兼相爱、交相利”为目标的充满人道关怀的道德乌托邦社会。

一、“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道德理想

墨学是在先秦时期影响力可与儒学相比拟的显学。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礼而用夏政。”这段记载大致反映了墨学的学术渊源,至于墨家脱离儒家另立门户的原因,恐非象字面表述仅仅是因为儒家的繁文缛节。因为,这些繁文缛节只是儒家礼制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是儒家倡导的等级秩序,这才是墨家要极力反对的。墨家的兼爱主张显然是与儒家“爱有差等”的等级秩序格格不入的。

“兼爱”借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主张“人类之爱”,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类似基督教式的博爱思想。这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显然是一种极富乌托邦色彩的社

会理想。墨家倡导的兼爱思想是在批判“交相恶”的社会现状中展开的。墨子深恶痛绝地揭露了当时“国之与国相攻,家之与家相篡,人之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兹孝,兄弟不和谐”的残酷现实。认为这种“交相恶”现象的产生,源于彼此间的“不相爱”,即“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人独爱其身,不爱人之身”。而天下之人彼此皆不相爱是导致全社会“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的最大祸害。他认为,解决这个最大祸害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倡导并推行“兼相爱、交相利”,即要努力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此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良治状态。^①墨子的兼爱思想还表现在他的民生关怀上,他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②他认为只要大家都抱有一颗博爱之心,就能实现“老而无妻子者,有所恃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③的社会理想。

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他整个社会理想的核心,他的“尚同”、“非攻”等主张都只是其兼爱思想的拓展,或是为实现兼爱理想而采取的手段。墨子的兼爱思想体现

收稿日期:2010-04-08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中国传统‘士’的道德理想及其社会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JA09266S)

作者简介:沈慧芳(1966-),浙江龙泉人,武夷学院政教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了战国时期普通百姓对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与向往,尽管他主张的这种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没有差等的爱在专制等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仍不失为一幅极具吸引力的社会蓝图。“如果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能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普遍伦理理则,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宁、祥和与美好。”^[1]

二、“尚贤”与“尚同”的政治道德理想

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治理的根基,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集贤良之士。他借“古者圣王为政”之名强调要“列德而尚贤”,即在用人上要做到“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2]以此建立“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3]的用人机制,这是一种极富现代意识的政治思想。墨子还对他的尚贤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如就如何聚集贤良之士,他认为如果要聚集善于射箭和驾车的人,一定要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同样的道理,要聚集贤良之士,也应使他们富裕、显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与赞誉,更何况,贤良之士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理应受到善待。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引用了古代圣王用人的故事,以资论证,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治国之道,就不能不崇尚贤士。“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闾天、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4]墨子的尚贤理想说到底还是幻想通过尚贤,使整个统治阶层都是具有高尚品德和杰出才能的贤良之士组成,而最高统治者国君更应是一位具有完美道德情操的人,是一位“哲学王”。墨子的政治理想实际上与儒家致力追求的圣人治理下“三代之治”的理想有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举贤良是服从于“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原则的,是后者的补充;而墨家则将举贤良放到中心的位置,摒弃了儒家等级观念的选人用人标准,内涵着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这是非常可贵的。张永义认为,墨子尚贤学“破天荒第一次道出了平民要求参政的呼声。”^[5]程有为认为墨子的尚贤思想完全打破了旧的贵贱等级观念和传统的亲亲观念。^[6]

作为尚贤政治理想的发展,墨子还提出了“尚同”的思想。他幻想建立一种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规范为规范、以上级的是非为是非的纲纪整肃、是非统一、政令畅通的理想政治秩序,即所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当然,墨子尚同的前提是尚贤,即作为下级表率的上级必定是一个品德高尚的贤

良之士,其是非定是正确的。有人指责墨子的尚同似乎又回到他反对的等级秩序上去了,因而认为其思想是内在矛盾的。其实这种指责没有道理,因为即使在当代民主法制社会也主张政令畅通,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也要求下级服从上级。这是行政秩序的要求。关键在于上级制定的规范是否合理,上级的是非观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根本标准。而这标准是墨子在尚贤中已经预设了的,即预设了统治者都是贤良之士,都能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从墨子的一贯主张看,他崇尚和平和谐(这在后面的“非攻”思想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反对战争与动乱,因此不可能主张下级对上级的不服从,因为那将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根据史料,在墨家组织内部就是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纪律的,而且墨子(作为墨家的第一任巨子——最高首领)及其继承者们也确实能够处处以身示范,很出色地履行了贤良领袖的职责。

三、“非攻”的天下和平理想

墨子的“非攻”思想在他的全部思想理论中显得相当突出,当然他的非攻思想也是从兼爱思想发展出来的,是兼爱之“树”上长出来的一颗树杈,也是兼爱理想在“国际”社会关系中的体现。冯友兰说:“兼爱”与“非攻”是一种思想的两面,这种思想就是非暴力论。‘兼爱’是非暴力论在内政方面的表现,‘非攻’是非暴力论在外交方面的表现”^[7]在诸侯混战的背景下,反对暴力,积极倡导并致力于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体现了一种渴望天下和平的美好理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和平或者说国际社会间的和平。因为在当时,人们并不了解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在他们眼中,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墨子对战争特别是“攻伐无罪之国”战争给人民与社会带来的灾难与后果深恶痛绝,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与批判,对攻伐兼并战争的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一是战争不仅造成了“饥寒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8]还造成了男女久不相见,影响了人口的增长;二是战争不仅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造成了“废民耕稼树艺”和“废民获敛”;^[9]三是战争对攻伐国本身也不利,墨子在劝诫楚王不要去攻打宋国时,从功利角度出发深刻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楚国有土地方圆5000里,有云梦泽、犀牛麋鹿,有丰富的鱼鳖鼃鼃,却还要去攻打方圆只有500里的贫脊宋国,这种行为就好比是舍弃自己华丽的彩车去偷邻居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去偷邻居的粗布衣服,是得了“亏不足而重有余”、“争有余而杀不足”的“好战病”,其结果完全是得不偿失。^[10]墨子还就当时人们对战争行为的“不义”缺乏认识,特别是对统治者在小事(如

一般的偷盗行为)上讲仁义,而在大事(攻伐无罪之国造成大量杀伤)上不讲仁义的行为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他指责公输盘为了兑现承诺、不愿放弃帮助楚王攻打宋国的行为是“义不杀少而杀众”,是“不知类”。

墨子不仅在理论上极力反对攻伐战争,而且以实际行动努力阻止战争的暴发。在《公输》这一故事中,他最终以其坚决维护和平的凛然正气、超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战争防御才能,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他虽取得了成功,但故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楚王最后放弃攻打宋国并非被墨子的理论说服和感动,而是因为他预计到不可能打赢。楚王和公输盘对战争的态度,特别是故事结尾,墨子在回国路上想入宋国躲雨而被宋人拒之门外的极具反讽意味的情节,暗示了墨子倾力追求的和平理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终究只是一个乌托邦。但尽管如此,墨子及其流派,为争取和平社会秩序的理想而耽精竭虑、摩顶放踵的感人形象却跨越2000年的历史时空而经久不衰。

如果对墨家的社会理想用现代的语言进行概括,似乎可以作如下描述,即他要努力构建的是一个政治清明、唯德是举,统治者品德高尚、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令畅通、秩序良好的社会;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没有剥削、欺诈,讲求节俭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没有战争、彼此之间和平相处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活脱脱就是一个“大同世”,难怪侯外庐先生将墨家的社会理想看成是后来“大同”理想的张本。侯外庐认为墨家的实际政纲是“主张建立古代民主政治”、“墨家所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共同劳动、有财相分、互瞻不足的崇高理想,已经洞察到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1]56-7}

墨家的社会理想及其主张较全面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理想与期待,即便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不乏合理与闪光之处。汤因比等认为墨子的学说“对现代社会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6]25}

但由于其核心思想和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在那

个时代是根本“不合时宜”的,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专制等级社会都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其命运也可想而知。墨家的主张不仅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纳而转化为现实的施政纲领,而且还受到同时代儒家的激烈批判。孟子甚至把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斥之为“无君无父”的禽兽行为。^⑦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墨家及其学术思想也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也恰恰是墨家思想的这种“不合时宜”,从反面衬托出了它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深度批判与超越,由此彰显了其理想的浓厚乌托帮色彩。墨子及其创立的学派也因此成为了闪耀在轴心时代天空中最璀璨的星座之一。

注释:

- ①《墨子·兼爱中》
- ②《墨子·尚贤下》
- ③《墨子·兼爱下》
- ④《墨子·尚贤上》
- ⑤《非攻·中》
- ⑥《墨子·公输》
- ⑦《孟子·滕文公下》

参考文献:

- [1]陈道德.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J].哲学研究,2004,(11).
- [2]张永义.墨——苦行与救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3]程有为.墨子尚贤思想简论[C]//萧鲁阳.中原墨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5]侯外庐.中国历代大同理想[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6]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责任编辑:高 煥

Mohist Thought of Moral Utopia and its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hen Huifang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Mohist thought of moral utopia includes the social moral ideal of universal love and mutual benefit, the political moral ideal of valuing talented people and valuing conformity as well as the peaceful ideal of non-offence. The moral ide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love is no more than a kind of Utopia in feudal rank society and autocratic system. But it truly reflects people's good wish for equality, democracy and peace in the turbulent society in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meanwhile it sharply criticizes the social reali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moral utopia; universal love; valuing conformity

墨家的道德乌托邦思想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作者: [沈慧芳, Shen Huifang](#)
作者单位: [武夷学院政教部, 福建武夷山, 354300](#)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10, 12(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6条)

1. 陈道德.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J]. 哲学研究, 2004, (11).
2. 张永义. 墨一苦行与救世[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3. 程有为. 墨子尚贤思想简论[C]//萧鲁阳. 中原墨学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一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5. 侯外庐. 中国历代大同理想[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6. 汤因比, 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荀春生, 等,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1006004.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64506932-0ffe-46f8-add1-9ecb00fd4628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0日